

第四章 石印术与清末民初 扫叶山房之新变

鸦片战争以后,西方铅、石印技术先后传入中国,使传统的雕版印刷事业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同光以来,沪上陆续出现了许多以铅、石印为主的新式书局。至清末民初,大部分传统书坊纷纷弃木刻而改用铅、石印。在这种形势下,扫叶山房于清末民初采用石印新技术,大量翻印古籍,同时还编辑发行期刊,以顺应时代之变化。

第一节 石印术在上海的传入与运用^①

石印术发明于十八世纪末的德国^②,约自十九世纪二三十年代

① 本节为 2005 年博士论文所无,此次修改时增入。

② 发明人为 Alois · Senefelder(1771—1834),中文文献中有塞内费尔德、施内费尔德、森洛费尔德等多种译法,撰有 A Complete Course of Lithography 一书,1819 年。

由欧洲传教士们传入中国,并在十九世纪末的上海风行一时,一度取代雕版印刷成为当时出版业的主流。民国初,石印的主流地位逐渐为铅印所取代,但仍一定范围内被持续使用。

扫叶山房主人在其民国七年(1918)所编《扫叶山房发行石印精本书籍目录》(以下简称“《石印精本目录》”)的序言中,对石印术在上海的传播过程有较为详细的描述:

自泰西摄影术入中国,而印书开一新纪元。维时风气初开,疑信参半。信者喜其成书之速,且精美异常也;疑者虑其不能传久,纸墨或易渝也。故四五十年前出板之书,大都密行细字,便场屋舟车之用,善本精印十不得其一二焉。其时官私刊本流布颇广,石印书亦实不能于其中分一席。此所谓萌芽时代也。科举既废,新政聿兴,革装书籍,挟新思潮以输入,活板印刷盛极一时。故籍陈编,束诸高阁,而石印书亦受影响。此其中衰时代也。虽然,吾华立国五千年,其文明蕴蓄者深且久,纵或一时停顿,决无终废之理。古学复兴,今其时矣。第以政体屡更,海内云扰,板本摧毁,手民流散;而一二石印精本,始见重于当世之士夫,纸墨焕然,历岁如新,乃信成之速而传之久者,石印兼擅其胜。此殆将为代兴之时代欤。^①

^① 参见《扫叶山房发行石印精本书籍目录》卷首,扫叶山房民国七年(1918)编民国十二年(1923)重订本。

这是一个石印出版者对上海石印业发展的描述^①，其自身采用石印技术出版书籍的过程，也体现了上海石印业从萌芽、中衰乃至代兴的发展过程。因此，在考察扫叶山房石印书籍之前，有必要先对该技术在上海的传入、运用及技术本身的特点进行调查，以便更好地理解扫叶山房石印本的特点。

(一)

石印术(Lithography)是一种平版印刷技术^②，利用油水相拒的化学原理印刷。具体做法是，先在一种含有油墨的纸上抄写文字，然后将文字面朝下，沾水刷之，然后利用特制的化学墨把文稿转移到印石上，再覆纸印刷即可。这是石印发明之初所使用的方法，被称为手写石印法。后石印术不断得以改进，1859年照相石印法发明。其方法是利用照相技术将文稿摄制成一种阴文湿片，然后将其落样于涂有感光胶的胶纸上，再按照上述石印的方法将图文落

① 这一描述与后来研究者关于石印在中国之发展的描述不太一致。多数人认为科举的废兴是石印业盛衰的关键因素，自科举废除后石印一落千丈。本人博士后报告《晚清民初上海石印书籍出版研究》，对此进行了具体讨论，复旦大学历史学博士后流动站出站报告，2011年3月。

② 石印最初发明时所用的石版在后来被不断改进，陆续出现了利用不同于石版的材料进行印刷，如木板、金属版等，但是印刷方法和过程都没有发生变化，仍然是一种平版印刷术，因此石印在广义上也成了平版印刷术的代名词。

样于石版后刷印而成。^①

石印术传入中国的时间,大约在道光年间。这时照相石印术还没有发明,所以当时主要运用的是手写石印法。手写石印法的传入主要与两位英国传教士有关:一位是马礼逊(Robert Morrison 1782—1834),一位是麦都思(W. H. Medust 1796—1857)。^②二人先后于道光年间在广州使用石印技术进行印刷。根据台湾学者苏精的调查,除上述二人外,当时在广州、澳门等地的一些传教士和外国商人也开始零星使用石印印刷出版,但未成规模^③。

石印传入上海的时间大致在同治以后。此时,石印的两种方法已逐渐为上海民间所知晓。如同治间人毛祥麟《墨余录》中有“吃墨石”一文,记曰:

泰西有吃墨石,以水墨书字於纸,贴石上,少顷,墨字即透

① 因石版笨重且不易涂上感光溶液,在石版上制版比其他材质要麻烦。所以,这一技术被不断改进。民国九年(1920)上海商务印书馆采用将图文摄制成阴文湿片后落样于亚铅版(即锌版)上。这种方法虽然已经不再使用石印制版,但是原理和方法都同于照相石印,所以在当时仍被称为石印。有关照相制版诸法,参见贺圣鼎《三十五年来中国之印刷术》一文,载张静庐《中国近现代出版史料初编》,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页257。

② 张秀民《中国印刷史》,页579。又,关于马礼逊与石印的传入,详见苏精《马礼逊与中文印刷出版》一书,台湾学生书局,2000年。

③ 详见苏精《马礼逊与中文印刷出版》。

入石中,复以水甲刷之,则有字处沾墨,无字处不沾,印之与刊板无异也。又,西人能为极细字,在分寸间可写千言。以显微镜窥之,笔笔精到,宛如大字。其法初亦用显微镜,扩小为大,写成底本。又用照画法,缩大为小,影而下之,故能穷尽豪发。兹因吃墨石而类记及此,亦一奇云。^①

此文所介绍的正是手写石印和照相石印两种方法。毛祥麟,字对山,上海人,生活于同治年间。《墨余录》一书最早于同治九年(1870)由湖州醉六堂刊刻行世。同治十年(1871)有杭州杨氏文元堂刻本,同治十三年(1874)又重编刊行。毛氏所记是目前所见中国民间最早介绍石印技术的文字。可见,同治早期,中国民间已对石印的两种方法有所耳闻。此后,传教士傅兰雅在光绪三年(1877)十二月的《格致汇编》上发表了一篇《石板印图法》^②,详细介绍了脱墨纸过石板法,即手写石印的方法。根据有关学者的研究,约在光绪二年(1876)之前,上海土山湾印书馆已开始使用照相石印术印刷。^③次年三月,英商美查(Ernest Major 约 1830—1908)创办的点石斋开始采用照相石印技术大量重印图画类书籍以及一些

① (清)毛祥麟《墨余录》,上海古籍出版社《明清笔记丛书》,1985年,页254。

② 张秀民《中国印刷史》认为傅兰雅一文为最早介绍石印方法的文字。

③ 参见净雨《清代印刷术小记》一文,载张静庐辑《中国近现代印刷史料二编》,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又,邹振环《土山湾印书馆与上海印刷出版文化的发展》,载《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3期,页1—14。

字典。光绪八年(1882)专办石印的同文书局开业,主要利用照相石印术缩印大型丛书,如《古今图书集成》等。光绪十年(1884)美查又创办《点石斋画报》,大获成功。叶九如称英人美查:“办点石斋石印书局,缩印八股文小本各书。后有同文书局、鸿宝斋等各大家。是始铅石印书海内风行。”^①

翻阅光绪五年(1879)至光绪十三年(1887)的《申报》,可以发现上海民间以木刻为主的传统书坊约在光绪十二年(1886)之后,才开始大量采用石印出版或发售石印书籍。扫叶山房光绪十年(1884)后修订印行的《扫叶山房书目》中有木版和铅版两大类,而无石印书籍,说明此时扫叶山房尚未开始采用石印技术。其首次刊登的石印书籍广告是光绪十二年(1886)六月二十三日的“精写石印《说文通检》”。又,光绪十四年(1888),朱记荣辑刻《槐庐丛书》五编时,其中有少数几种书的内封采用石印;光绪十五年(1889),扫叶山房所刻《李氏五种》之内封、地图,均用石印技术印刷,可见是时扫叶山房已开始采用石印,但利用程度不高。今所见扫叶山房石印本,多出版于光绪二十年(1894)以后(详见附录3)。

光绪二十二年(1896),上海书业公会制定《石印书籍草议》,说明此时上海书业已普遍采用石印技术^②。又据光绪三十年(1904)

^① 参见叶九如“致上海书业同业公会理事函”,收入《上海书业公会崇德堂财产向上海书业同业公会移交的有关文书》,上海档案馆档案:全宗号 S313-1-43。

^② 《清朝书业公会石印书籍章程》,上海档案馆档案:全宗号 S313-1-119。

《上海书业公会书底挂号簿》统计,当时传统书坊中,除少数几家书坊以铅印为主以外,余者多以石印出版为主。其中扫叶山房南北号在光绪间共出版铅、石印书籍 132 种,其中石印 103 种,铅印 19 种^①。扫叶山房民国七年(1918)所编《石印精本目录》序云:“因铅板不便,易以精本石印行世。”是知其于民国中已基本不再采用传统的雕版印刷。

(二)

石印术传入上海后,手写石印与照相石印的两种方法都得到了充分的利用。虽然手写石印法最早传入中国,但在上海被广泛运用的是照相石印技术。

照相石印,是一种影印技术,可以对刻本、活字本、铅印本、石印本、钞本、稿本等任何形式的文稿不断地进行复制。因此,这一技术使得书稿的重印和再版变得相当便捷。石印不像雕版那样需要保留版片。一般来说,石印书籍第一次印刷以后,如果短期内没有重印需求,原有的印石可以被清洗磨平,再加利用。书籍需要重印时,可用照相摄制成底片重印;而即使摄制的胶片未留底,采用照相的方法再次影印即可。如扫叶山房《邵亭知见传本目录》民国十二年(1923)的石印本,即以民国七年(1918)的石印本为底本影印。民国七年本牌记题为“民国七年石印”;民国十二年本内封则

^① 《上海书业公所书底挂号簿》,上海档案馆档案:全宗号 S313-1-77。

题“民国十二年影印”，二本版式字体完全一致，只是前者墨色油渍较后者明显。

照相技术还能将所摄图像随意放大缩小，因此，按照影印的书籍所再现原书的实际效果，可以分为以下三种情况。

其一，缩小影印。这是上海石印业发展之初最为常用的方法。一般指不改动原书的文字和行款，按一定的比例缩小原书的版匡。这样缩印后的石印本，一页可以排到原书的两页甚至三页，诸如《佩文韵府》、《渊鉴类函》这些动辄上百册的图书，都可以缩印成几十册。这种方法节省了出版商的成本；对读者而言，既节省藏书的空间，又便于携带，颇受读者欢迎。如点石斋在光绪六年（1880）最先采用照相石印缩印《康熙字典》。是书大受读者欢迎，此后在光绪年间被重印次数高达十二次。扫叶山房亦曾石印缩印此部字典。

其二，重排影印。这实际上也是一种缩印方法，但是因为修改了底本的行款，所以另列一类。如点石斋光绪八年（1882）缩印的《史记》，以汲古阁本为底本，原行款为十二行二十五字，缩小石印后为二十二行五十字。这种做法实际上是将原书剪开，两行拼成一行后再照相制版，进行印刷。此方法缺点很多，尤其是改变原书的行款，剪贴重排，使原书面目全非，极易发生错简、脱漏之现象，因此多为人所诟病，如《庄谐选录》卷六“谈石印书”中云：

又凡石印，必须缩小及割裂，然他书可缩，而有关大小长短程度者，必不可缩；他书可割裂，而表则不可割裂；今石印书

于此二事皆忽略,殊可恨!①

笔者暂未在扫叶山房的石印本中发现此类重排影印本。

其三,原大影印。指按原书真实面貌进行照相制版,基本不改变底本的尺寸。明清以来,宋元本日稀,故藏书家颇为宝贵宋元古本。此风至晚清尤盛。当时私家刻书,尤其重视覆刻旧刻旧抄。如光绪初黎庶昌所辑《古逸丛书》,即请日本雕刻高手影写上版。而照相石印技术对于古本复制,与影刻相比,不仅方便快捷,更重要的是能形神毕肖。叶德辉在《书林余话》中谈到乾嘉时期的影刊宋本时,对用照相石印之法影印善本极为赞赏:

然古书形式易得,气韵难具。诸家刻意求工,所谓精美有余,古拙终有不及。由于书法一朝有一朝之风气,刻匠一时有一时之习尚,譬之于文扬雄之拟经,于诗束皙之补亡,貌非不似,神则离矣。海通而后,远西石印之法流入中原。好事者取一二宋本书照印流传,形神逼肖。较之影写付刻者,既不费校讎之日力,尤不致摹刻之迟延。艺术之能事,未有过于此者。惟其所印者未能遍及四部,成为巨观。②

① 参见《上海石印书业之发展》一文,原载光绪十五年(1889)五月二十五日《上海北华捷报》,收入张静庐辑注《中国近代出版史料补编》,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

② 参见叶德辉《书林清话》,页275。

尽管如叶氏所言,照相石印虽未能遍及四部,成为巨观,但清末民初,照相石印术还是被许多书坊充分利用,影印出版了不少精刻本。这也成为石印业得以在民国间持续发展的一个因素^①。

扫叶山房从宣统年间开始,利用照相石印影印了不少精刻本,其中主要代表有:

《郑板桥全集》,宣统元年(1912)石印影印乾隆五十年(1785)司徒文膏精刊本。

《李长吉集》,宣统元年(1912)彩色石印影印光绪十八年(1892)叶氏朱墨套印本。

《书目三种合刻》,民国三年(1914)石印。其中《藏书纪要》为影印士礼居嘉庆十六年(1811)刊本;《季沧苇藏书目》,影印士礼居嘉庆十年(1805)刊本(图 32、33);《汲古阁珍藏秘本书目》,影印士礼居嘉庆十五年(1805)刊本。

《薛涛诗》,民国四年(1915)石印,影印嘉庆十五年(1805)古倪园沈氏翻明万历本。

《杜诗详注》,民国四年(1915)石印,影印康熙刻本。

《温飞卿诗》,民国九年(1920)石印,影印康熙间顾氏秀野草堂刻本。

^① 关于石印影印宋元善本方面的特点,可参见李培文《石印和石印本》一文,载《图书馆论坛》1998年第2期,页78。这一特点已为多数研究者所关注,因此本文不再重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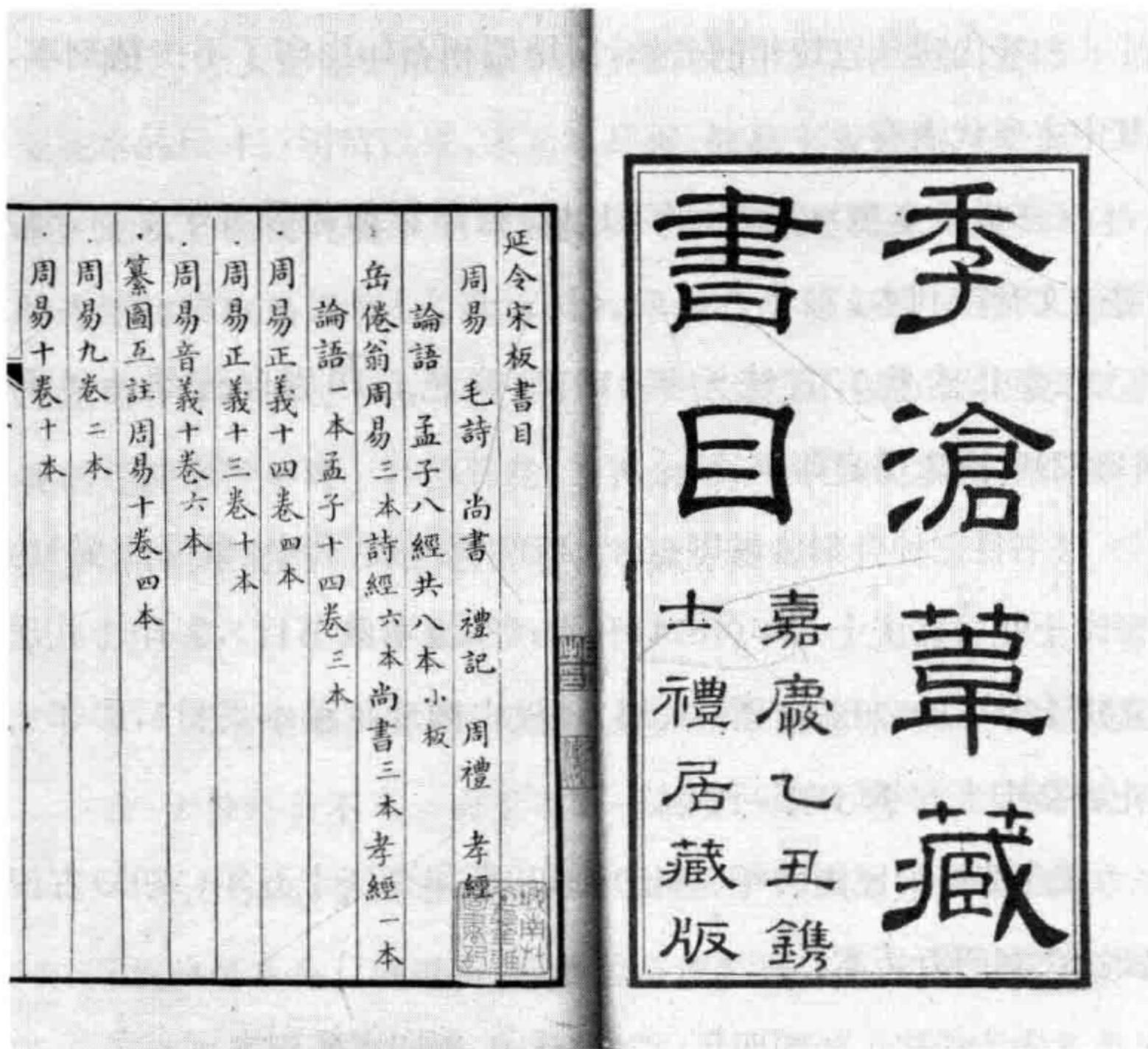


图 32:《季滄葦藏書目》一卷 (清)季振宜輯 嘉慶十年黃氏士禮居刻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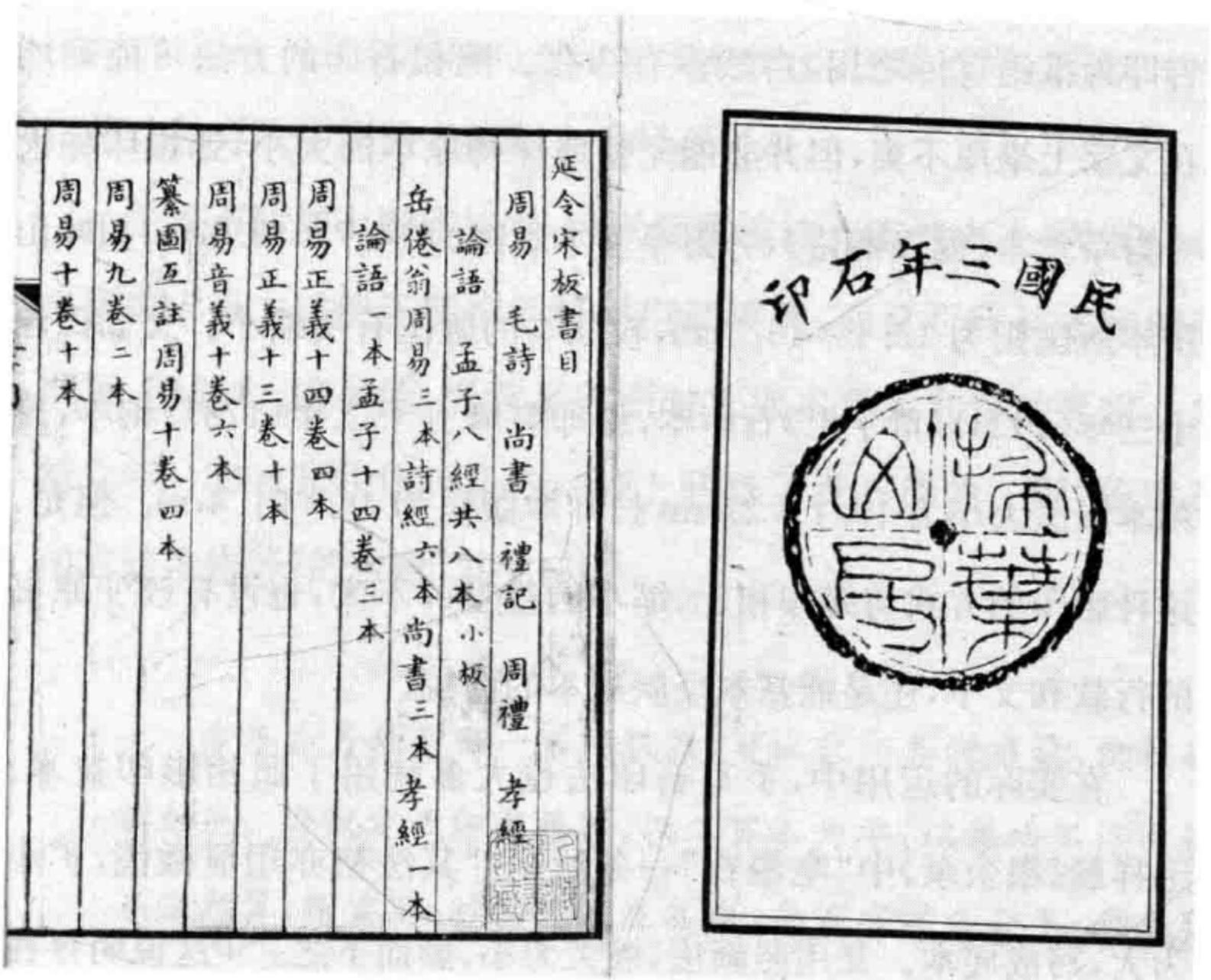


图 33:《季沧苇藏书目》一卷 (清)季振宜辑 民国三年
扫叶山房石印影印嘉庆十年黄氏士礼居刻本

《书经集传》，民国十七年石印，影印明汲古阁刻本。

扫叶山房凡采用照相影印方式的石印本，一般在封笺书名前冠有“原本影印”四字，并在广告中称与原本“毫厘不爽”。书籍广告即为推销宣传之用，自然多有夸张。照相石印的方法可能确能在文字上毫厘不爽，但并非能完整地保持原本的大小，如影印顾氏秀野草堂本《温飞卿诗》，秀野草堂本版匡为 14.7×19.1 cm，扫叶山房本版匡则为 12.1×15.7 cm，较原本的版匡有所缩小。又如民国十三年(1924)《草字汇》石印本，影印乾隆五十二年(1787)刻本，原刻本版匡大小为 19.1×27 cm，扫叶本版匡为 16×21.4 cm。但是，这种影印的方式与缩印相比，缩小的程度并不大，也没有改变原书的行款和文字，还是能基本反映原本的面貌。

在实际的运用中，手写石印法也大多利用了照相影印技术。毛祥麟《墨余录》中“吃墨石”一条所记：“其法初亦用显微镜，扩小为大，写成底本。又用照画法，缩大为小，影而下之。”^①这说明存在一种先在纸上抄写底本再摄影的石印方法。^②今天一些图书馆藏有一种超大型的钞本书，开本相当大，每本上有说明文字，诸如“上海共和书局石印底本”、“上海天成书局石印底本”等。抽取同种书与之相比，除开本大小悬殊外，字行均无二致，并且这些大型钞本

① (清)毛祥麟《墨余录》，页254。

② 黄永年《古籍整理概论》中认为照相石印方法有五种，其中一种就是用楷书抄写后摄影石印，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页38—39。

上面有一些描润修改的地方,因此又被称之为描润本。这说明在印制之前,对原稿进行校对修改,再摄缩成一定规格的尺寸。^①这种方法虽然也利用了照相石印的方法,但是其呈现出来的仍然是手写的特征,与复制原稿的石印影印本相比,性质不同,因此,本书仍将这种方法印刷的书籍称为手写石印本。

手写石印加上影印技术,可以随意缩放文本的大小,尤其适合出版需求量大又便于携带的科举应试读物,而且石印技术印刷周期短、印量大、成本低,能满足印刷时艺课本量大利厚的要求。光绪六年(1880)五月廿四日《申报》上刊登了点石斋的一则“价廉石印家谱杂作等”的告白,其文曰:

今本斋另外新购一石印机器,可以代印各种书籍,价较从前加廉。今议定代印书籍等,以二百本为率,以每块石连史纸半张起算,除重写、抄写费不在其内:每百字洋三分半,每半张连史纸仅需洋一分。比如,连史纸半张分四页,书内六十页共石板十五块,印书二百本共连史纸三千个半张,以每张一分

^① 参见国家图书馆苏铁戈《漫话中国的石印本书籍》,载《图书馆学研究》1987年第2期,页147;又,南京图书馆李培文《石印和石印本》一文,载《图书馆论坛》1998年第2期,页78。此外,笔者咨询上海图书馆研究员陈先行先生,确认上图也藏有此类底本。又,今清华大学图书馆藏有同文书局影印《古今图书集成》之描润本,参见裴芹《〈古今图书集成〉研究》,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1年。根据上述各文,可以推测光绪年间《上海书业公所书底挂号簿》(上海档案馆档案:全宗号S313-1-77)中所谓书底即指此类大型钞本。

计,共洋三十元。如书内共三万字,除抄写价外,计洋七元五角;共书二百本,不连订工只须洋三十七元五角。倘自己刻木板,其费约四十五元,刷印及纸料尚不在内也。两相比较,实甚便宜。况石印之书比木板更觉可观乎?又如书页欲缩小、加大,亦照半张核算。^①

根据告白所述,石印两百本书籍,除装订钱以外,总费用为三十七元五角。据此计算,一本六十页的书石印成本仅一毛八分多,即使算上装订费,成本也相当低。刷印和纸料费用还不计在内。若以此为参照,同文书局光绪十一年(1885)所印《加批四书味根录》,每部洋贰圆,获利当为十倍乃至二十倍之多^②。

光绪年间石印出版的时艺课本,大多为蝇头小楷书写,字划细小,行格紧密,扫叶山房在光绪间出版的石印本多以楷体书写,字划细小,行格紧密,大多在每半叶十四行三十字以上。据同文书局创办人徐润回忆,当时时文课本的销路甚好,如广百宋斋光绪十一年(1885)“七月中到宁开市,二十天各书均已销,颇得利息。仍贪心不足,续来办货二万余金”。^③

① 《申报》第二千五百七十四号,第六版。

② 上述数据中反映的价格虽然不在同一年,但亦相差不远,在短短几年内波动应该不是很大。

③ (清)徐润《徐愚斋自叙年谱》,《续修四库全书》史部第558册,影印民国十六年(1927)香山徐氏铅印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

光绪三十年(1904)科举制度废除以后,这类石印书籍没有了市场。但是石印术并没有因此迅速退出古籍出版业。日本学者泷井孝三曾指出,废除科举之后,石印本反而更为盛行。他认为石印术需要合适的原稿书写人选,而科举制的废除出现了大量从政失败的文人,从而满足了石印业对原稿书写人员的需求,而石印本中“所用的典型楷书字体,与科举应试所用的翰林书体一致”。^①从石印技术本身的特点来看,手书上版的字体比用金属刻刀刻出来的字体,在线条上要自然,因此“石印的另一优点是比木刻容易保存书法的优美,石印局都雇有若干书法好的人”。^②故宣统以来,扫叶山房、文瑞楼等书坊仍大量石印出版文人别集,其书多用端楷缮写,字体较大,行格亦相对疏朗,颇受当时的读书人欢迎。扫叶山房常在书籍广告中将此类石印书籍称之为“大字精本”。所谓“大字精本”,应是相对光绪间的蝇头小楷之缩印本而言。如“大字精印《纲鉴易知录》”广告曰:

惜木板漶漫,缩印本字迹过小,有碍目力。本号特缮大字精本,并延名宿,悉心雠校,付诸石印。^③

① [日]泷井孝三《石印本の歴史の一斑について》,载《书志学》1981年第26号,页24—26。

② 参见《上海石印书业之发展》一文。

③ 参见《扫叶山房书目》卷首,民国十三年(1924)扫叶山房重订本。

畜德錄卷一

洞庭席啓圖文輿甫纂輯

七世孫席素彬緒生甫恭繕

七世孫席素燾少雲甫校對

七世孫席素揚少梧甫重刊

九世孫席德鑫念曾甫發行

立志

晉虞溥為鄱陽內史。大修庠序。廣招學徒。獎諭之曰。文學諸生。皆冠帶之流。年
 盛志美。始涉學庭。講修典訓。此大成之業。立德之基也。夫聖人之道。淡而寡
 味。始學者不好也。及至期月。所觀彌博。所習彌多。然後心開意朗。敬業樂群。
 忽然不覺大化之陶。已至道之入神也。故學之染人。甚於丹青。丹青吾見其
 久而渝矣。未見久學而渝也。丹青亦是一染之後。不復更染。故夫工人之染。渝色若學則無時不染。夫安得渝。夫工人之染。
 先修其質。後事其色。質修色積。而染工畢矣。學亦有質。孝弟忠信是也。君子
 內正其心。外修其行。行有餘力。則以學文。文質彬彬。然後成德。夫學者不患



畜德錄

卷一 立志

掃葉山房石印

图 34:《畜德录》二十卷 (清)席启图辑 民国间扫叶山房手写石印本

如其民国间石印《畜德录》一书,由该书作者七世孙席绪生亲笔缮写上版,书法尚属精良(图 34)。

综上所述,无论是照相石印,还是手写石印,其印刷出来的书籍在版本特征上都顺应了中国人对于书籍的审美习惯:其中照相石印能完整地复制善本,而手写石印则在某种程度上能实现国人在印刷技术上对书法艺术的追求。或许这也是石印技术传入上海后,能在较短时间内迅速风行并一度成为出版业主流的原因之一。

第二节 扫叶山房石印本的特点

扫叶山房自光绪中采用石印技术以后,逐渐放弃雕版印刷,至民国间已完全改用石印出版书籍。据民国七年(1918)《扫叶山房发行石印精本书籍目录》统计,自清末至民国七年,扫叶山房出版的石印古籍多达 419 种。光绪三十年(1904)清政府废除科举制度,对当时以出版科举应试读物的书坊影响较大。本文以此时间为界,将扫叶山房石印书籍的出版历史作一粗略划分:从光绪中期开始采用石印至光绪三十年(1904)左右,为其石印古籍出版之前期;此后至民国八年(1919)左右为其发展之后期。以下分别考察其前后期石印出版书籍的内容特点及版本特征。

(一)

光绪三十年(1904)以前,扫叶山房主要以石印术印行适于科